《清史稿》编纂研究

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

——《清史稿未刊稿丛编·序》

冯明珠

民国三年春，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议："请特设清史馆，由大总统延聘专员，分任编纂，总期元丰史院，肇启宏规，贞观遗风，备登实录，以与往代二十四史，同昭垂鉴于无穷。"大总统袁世凯（1859—1916）遂于三月九日令设清史馆，延聘满清遗臣赵尔巽（1844－1927）为馆长，聘请通儒百余人，分任编纂，"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，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，用以昭示来兹，导扬盛美"。为了方便取得资料，并承继清代纂修国史的成果，馆址就设置在东华门内前清国史馆旧址，于九月一日正式开馆修史，至民国十六年底《清史稿》正式付印出版，翌年七月故宫博物院奉国民政府令就近接管清史馆，这是故宫与清史馆结缘之始，也是现存"国立故宫博物院"（以下称本院）史馆档的来由。

清史馆从开始运作到被故宫接受，正是近代中国极其混乱的时代，内政上历经洪宪帝制、二次革命、宣统复辟、南北战争、五四运动、军阀混战、北伐等等，烽火遍地，内战频繁；外交上对德宣战、列强侵华，五卅惨案、汉口惨案接踵而来，北京政府风雨飘摇，随时覆亡；清史馆的修纂工作便是在政局动荡、经费奇缺、人心惶惶中持续进行了十三年整。民国十六年的八月，北伐军已接近北京，局势更为混乱，馆长赵尔巽见初稿大至完备，自己年高龄八十四，生命垂危，极思将《清史》付印，遂于八月二日撰就〈发刊词〉，言明急遽付印之缘委："本应详审修正，以冀减少疵颣，奈以时事之艰虞，学说之庞杂，尔巽年齿之迟暮，再多慎重，恐不及待，于是于万不获已之时，乃有发刊《清史稿》之举。"书名下一"稿"字，旨意明确，所有未臻完善之处，以待将来；同时致书全馆同人申明此意，并函请当时主持北京政府的张作霖（1875－1928），请其补助出版经费；九月三日赵尔巽病逝，遗书向张作霖推荐柯劭忞（1850－1933）代馆长职，袁金铠（？－1947）办理刊印《清史稿》事务。袁金铠到馆后，又荐金梁（1878－1926）入馆，实质执行编印工作。金梁到馆后，积极任事，作〈校刻记〉自称总阅，更动了原编清史馆职名录，修改了〈艺文志序〉，增加康有为（1858－1927）、张勋（1854－1923）合传及张彪（1860－1927）附传等，《清史稿》终于顺利出版。初刊一千一百部，每部含目录一百三十一本，分三期出书；十七年初，先发行五十册，至端午前已陆续全数印竣，金梁见时局紧张，北伐军即将入京，乃私运了四百部到东北，即后来所称"关外本"。

民国十七年六月九日，国民革命军和平开入北京，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，南北统一。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，并令故宫就近接管清史馆。故宫乃邀原清史馆协修朱师辙

［收稿日期］2006－11－1

［作者简介］冯明珠，女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研究员

(1879－1969）协助清点清史馆馆藏，发现金梁不但运走了四百部《清史稿》，且修改了原稿，朱氏紧急通报馆长柯劭忞，召开会议商讨对策，经议商由金兆蕃（1869—1951）重撰卷首职名录，朱师辙负责将金梁改动处择其重要者抽换重印，即所谓“关内本”。

民国十八年十月，赵尔巽旧部属刘赞廷建请正式发售《清史稿》，引发国民政府内部对《清史稿》立论的质疑，国务会议决议行文故宫，将印好的《清史稿》与清史馆所有馆藏，悉数移送南京，以便审查；故宫则因清史馆馆藏大多原属清国史馆，亦即清宫旧藏，不愿将馆藏南运，因而爆发了故宫博物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清史馆馆藏之争。故宫博物院一方面与南京中央协商，一方面积极将原属清国史馆的档案与图书移存南三所（故宫文献馆），最后列举《清史稿》十九条谬误，吁请政府永久封存，禁其发行，提出由故宫编纂“清代通鉴长编”作为重修清史之预备。经过多方努力，故宫终于保留了大部分的清史馆馆藏，这就是现存“国立故宫博物院”“史馆档”的来源。

因此，本院所藏“史馆档”包括清国史馆档与清史馆档，本书选载的是《清史稿》未刊本。这些稿本是清史馆前后百余位纂修，经历了十三、四年的努力成果，内容与数量都十分丰富，以本院所藏论，有《清史稿》的初纂本、复纂本与定本；有不同纂修人撰写的同一类史稿；有纂修前的史料长编；也有未被《清史稿》采用的稿本。例如，清史馆辑〈太祖本纪〉一卷，〈太宗本纪〉与〈世祖本纪〉各上下两卷，各有初纂本、修改本、清缮本等三种稿本，由金兆蕃与邓邦述（1868—1939）合辑，非《清史稿》原稿；《清史稿》选刊的是经过柯邵忞覆勘的稿本，因此本书将金兆蕃与邓邦述合辑稿本扫瞄出版；又清史馆〈圣祖本纪〉共十五册，其中三册为奭良（1851—1930）覆辑，即《清史稿》底本，本书不刊载；其余十二册两套，内容大致相同，故选刊较完善的六册。本此原则，本书刊载了〈高宗本纪〉二十册、〈仁宗本纪〉、〈宣宗本纪〉、〈文宗本纪〉各六册、〈穆宗本纪〉七册、〈德宗本纪〉十册、〈宣统本纪〉一册。清史馆〈本纪〉大致依据清国史馆所纂〈本纪〉重辑而成，然重修前朝〈本纪〉与编纂国朝〈本纪〉间，是否有诠释与取舍的不同，则有待后人查考。

再谈清史馆未刊稿中的〈志〉。清史馆修〈志〉先辑“长编”，所谓“勾勒故实，编为长编”，遗留下来的未刊稿多属长编，史料价值极高。例如清史馆因应时代的变化，开创了〈交通志〉与〈邦交志〉，残存下来的〈交通志〉有罗惇曧（1885—1924）纂辑的〈船政〉、〈电政〉、〈邮政〉、〈路政〉，张启俊纂〈铁路〉、〈电报〉等各一册，俱为长编性质的史料汇编，而《清史稿》选刊的〈交通志〉则是王树枏（1851—1936）所修；因此，本丛编将罗惇曧与张启俊所辑的〈交通志〉予以刊载。又现存本院的〈邦交志〉稿本，也多属长编性质，其中吴广沛（1855—1919）编〈美国邦交志〉、〈义大里国邦交志长编〉、〈比利时国邦交志长编·刚果国附〉、〈荷兰国邦交志长编〉、〈墨西哥国邦交志长编〉、〈秘鲁国邦交志长编〉、〈巴西国邦交志长编〉、〈外债表〉、〈水陆通商口岸表〉、〈边地割让租借表〉等；戴锡章（1868—1933）编〈美利坚邦交志〉、〈俄罗斯邦交志〉、〈法兰西邦交志〉；李岳瑞（1852—1927）编〈英吉利邦交志〉；陈能怡〈邦交志日本上〉；骆成昌〈邦交志瑞典那威〉、〈日艾斯巴尼亚邦交志〉；刘树屏（1857—1917）〈万国保和会〉与〈万国禁烟会〉等等；这些稿本均非《清史稿》底稿，本稿丛一一选载。再者，清史馆纂修有〈国语志〉共九十九册，扣除重复者仍有八十八册，基本上是一部满文词典，根本未被纳入《清史稿》中。总计，本书选编清史馆未刊稿有〈本纪〉一百零一册约一万八千页，〈志〉一百七十一册，近六千页；〈表〉三十册，三千多页；其中〈国语志〉、〈建州表〉、〈宰辅表〉、〈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表〉等，则是《清史稿》中没有的类别。

将本院所存清史馆未刊稿予以出版的构想，发端于去年十一月初，为了庆贺故宫博物院八十院庆，图书文献处特别举办了“文献足征：第二届清代档案与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综合讨论中发言热烈，从大陆斥巨资

重修新清史，谈到“中华民国政府”出版的国防研究院本《清史》及十六巨册的《清史稿校注》，最后话题落到保存在本院的清史馆未刊稿上，庄吉发教授建议将之出版，陈捷先教授随之附议，当时主持综合讨论的石守谦院长慨然承诺，会后询问本人意见，余意以为随着时光流逝，清朝与民国间的恩怨已彻底泯灭，《清史稿》的评价渐趋正面，此时将清史馆未刊稿予以出版，一方面可彰显前人努力的成果，另一方面可提供重修清史者参考，是极有意义的文化工作；于是石院长批准了《清史稿未刊稿丛编》的出版计划。当然，沉香亭出版公司继出版《满文原档》与《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项目档暨方略丛编》后，仍愿意斥资支持图书文献处的这项出版计划，是本书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支撑。图书文献处的陈龙贵先生与郑永昌先生领着助理将未刊稿一一觅出，仔细校对，并由陈龙贵先生总其事与撰写凡例、庄吉发先生撰专文介绍，没有他们的负责、认真与细心，本书是无法于短短的一年中问世出版的。

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容或有误、或不够完备、或流于草率与零乱，然它表达了一个朝代结束之际史学工作者的思想与情感，其特殊的时代意义，非后代史学工作者所能替代，是为序。

关于《清史研究》变更征订的通知

尊敬的订户及读者:

感谢您多年来对《清史研究》的爱护和支持！并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您的支持！

《清史研究》从 2007 年开始，将全部改由北京市邮政报刊发行局发行，烦请您直接到当地邮局征订。欢迎您与我们联系！

《清史研究》编辑部

2006 年 12 月 1 日